



日本中國學文萃

王晓平◎主编

东洋史说苑

〔日〕桑原隲藏◎著

钱婉约 王广生◎译



中華書局



日本中国学文萃

王晓平◎主编

东洋史说苑

〔日〕 桑原隲藏◎著

钱婉约 王广生◎译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洋史说苑/(日)桑原隲藏著;钱婉约,王广生译.
北京:中华书局,2005
(日本中国学文萃)
ISBN 7-101-04622-3

I. 东… II. ①桑…②钱…③王… III. 文化史
-研究-中国 IV.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3314 号

书 名	东洋史说苑
丛 书 名	日本中国学文萃
著 者	(日)桑原隲藏
译 者	钱婉约 王广生
责任编辑	马 燕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9% 字数 185 千字
印 数	1-4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101-04622-3/K·1997
定 价	20.00 元



桑原隲藏（1871～1931），日本近代中国史研究的开创者之一。其治史风格有三：一、“以外国说明中国”，故能独辟蹊径，尤注重西域史、东西交通史等方面的课题；二、“科学的历史学”，故能广征博引，考证翔实；三、“深入浅出”，故行文条分缕析，明快简捷，引人入胜。他的《蒲寿庚考》等先驱性研究成果，获得国际学术界的极高评价。

《东洋史说苑》为作者生前亲自编订的短篇论文集。1927年出版后，以其文字清新可读，内容新颖超拔，成为不可多得的史学畅销书。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许多方面仍不失其魅力。本书为中国出版界（包括港台在内）的第一个中译本。

总序

王晓平

日本人(包括从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迁徙到列岛的人们及其后裔),至少从我国南北朝时代便揭开了研读中国典籍的历史,而伴随中国文化进入日本所产生的一系列文化现象,诸如写经抄书、创造假名、官中讲经、发明训读、朗咏流行、设明经文章诸科博士、藏典修史等等,构成了人类文化交流史上壮观的奇景。日本人审视中国的同时,也在成就着自身。不论是出于何种目的,从广义上讲,日本人研究中国,几乎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岁月,但学界真正把研究中国的学问称为“中国学”,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

长达一千五百年以上的中国研究史,是与日本文化的开创和发展紧密联系的。尤其在近代以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完全抛开中国学术史,便没有完整的日本学术史可言。但是,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研究中国的目的方法和态度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尽管中国传统的考据学、文献学的影响依然存在,但与西方学术同时也与本土固有文化研究建立的联系,远比与中国同时学术的联系敏感、紧密而又牢固。不论如何,从古至今,日本学界产生了众多研究中国的大学问家和名文名著。

日本人对中国的研究与中国自身的学术研究最大的不同,就



是主导这门学问的根本课题,是岛国日本如何面对大陆中国。它们不仅根植于异质的文化土壤,从属于日本文化体系,反映或者作用于当时日本的包括民族主义思潮在内的各种社会思潮,在日本学界获取评价,而且根本目标在于发展日本文化。所以尽管它们有时与中国本土学问面临着同一对象,然而两者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和价值。

在世界文化走出各自分割历史阶段的今天,国外中国学与中国的国学共同构成世界的学术中国观,而又各属不同的学术体系,发挥着不同的文化功能。对于我们的国学来说,国外的中国学可以说是不宜回避的“他者”,日本的中国学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

进一步说,日本中国学除了具有其他国家中国学的共性之外,还有一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离不开一个“近”字。例如,由于许多业已散佚的中国文献通过抄本或者刻本保存在日本,使得日本成为域外最重要的中国文献资料库之一;又比如日本拥有传统的阅读和训释中国文学的特殊手段等等,这给中国文献的传播和解读带来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同时,由于中日两国学术交流源远流长,日本中国学与日本学研究的关系特别紧密,也使得它在考据和比较研究这两方面,有着更多的资源和课题。

在日本,对日本古代学术文化的研究,常常不能与对中国的研究一刀两断,再加上现代学术谋求沟通的大趋势,便使得日本中国学者,例如内藤湖南、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等人的著述的影响超出了中国学的范围;另一方面,某些研究日本学的著述,例如明治时代的民俗学家、最早的环境保护运动力行者南方熊楠、有“知识巨人”、“时代代言人”之称的加藤周一、“文化功劳者”称号获得者



中西进等人著述中涉及到中国学的部分,也都有一读的价值。

日本近代以来在某些研究条件或手段上不同于中国本土,日本学人多重实闻亲见,不尚空谈,长于细读深究。他们在某些领域,例如中国宗教文化、敦煌文学、中外关系史、艺术史以及中国戏曲小说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曾给中国学人以启迪。日本从奈良、平安时代起逐渐形成一些接受中国文学的热点,如《文选》、《白氏文集》、《唐诗选》、《古文真宝》等,对这些作品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和成果,对中国学者的研究有着互补互鉴的作用。这些都使得中国学者对日本中国学报以热眼。学人多以“他山之石”、“邻壁之光”来强调这种关注的借鉴意义。

与此同时,中国学术界又从很早便有了对盲目追随日本学人态度的批评。早年章太炎先生对这种态度给予的辛辣讽刺,虽不免言之有偏,却仍不失警戒之功。前辈学者对于当年那些所谓“支那通”的揭露,更不该忘记。在中国学者对日本中国学展开系统研究的时候,仍有必要反对任何形式的食而不化与人云亦云现象,强调中国学研究的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的统一,葆有学术自信和识别眼力。

今天,更要看透那些变样翻炒“中国崩溃论”与“中国威胁论”的所谓“中国通”,他们往往将历史和现实作短线连接,凭借现代媒体和出版业,朝论夕改,张大偏见,仅就学术手法而言,也实不足为训。应该说,这些人虽然不是日本中国学界的主流,但是他们头上也顶着“大牌教授”、“中国问题专家”和“社会名流”的帽子,近年来忙不迭煽乎所谓“厌中”(讨厌中国)情感,就很有些拉着舆论走的能量。

然而,不能不指出的是,我们对日本中国学研究的价值,绝不



止于“借鉴”，也不应该停留在“此优彼劣”的结论上。对日本来说，日本中国学是日本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从整体上讲，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某一时期日本人的中国观、中国形象、中日关系。日本的知识界，往往通过它们认识中国、理解中国。研究中国的专家们，以及有些并非专门研究中国的思想者写的关于中国的著述，对短期或者较长期的社会思潮，有时甚至对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都起过某种作用。言说中国的学术话语与官方话语、媒体话语及民间话语等共同营造着中国形象，而其中学术话语的影响则更为长久深远。

另一方面，对于中国学人来说，通过这些著作来了解日本文化、认识日本人、解读日本人的中国观，或许也不失为一条途径。同时，我们对日本社会文化看得越透彻，就可能对日本中国学研究得更深入。

总之，在中日文化双方不能不互相正视的今天，对待格外重视师承流派、沉淀深厚、做派繁复、多变多样的日本中国学来说，草草一瞥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的是原始察终，辨源析流，叩同问异，进而学会平等地与其展开卓有成效的学术对话。既是对话，那当然不是只“知己”就行了，还必须“知彼”，而且不是一般的“知”，而是要深知熟稔。所幸我们已经有了《日本中国学史》、《日本汉学史》等专门的著述，让我们看到了日本中国学乃至国际中国学研究的广阔前景。

国际文化交流发展到今天，在人们对吸收外来文化倾注着空前热情的时代，面对别种文化发出自己的声音就显出更大的必要性。这种声音，不是自说自话，而要有往有复。因而，加强对国际中国学的研究，必然会与我们的“中国学”走向世界相联系。在这



一方面,日本学界可谓先行一步。为了推进国外的日本学研究,十多年以前,日本便建立了对外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最近又在法政大学中设立了国外日本学研究基地,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对国际日本学研究展开分析。以此反观我国知识界的一般认识,有些人多只看到那些操着怪腔怪调汉语的外国人在该国学界没成什么大气候,又爱发些对中国隔靴搔痒的议论,就轻看国际中国学研究的意义。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工作的紧迫性。

读书或可睹人。推进学术交流,化解误解误读,减少文化摩擦,出书、读书、品书与人员交流对话,是有力的两翼。我们阅读日本中国学著述的时候,如果不只停留在听他们述说什么,而进一步思考为什么会那样说,和同时期中国本土研究有哪些不同,那么,这些材料就可能演化为我们拓展本土文化研究和外国文化研究两大领域更有用的思想资源。

对于收藏在日本的中国文献,日本学者已经对文本作过比较深入的研究,但我国学者却常因为无法与原件谋面而深感遗憾。有些日本学者抱怨中国学者对日本存藏的中国文献抄本、刻本评价过低,而实际原因是这些资料一般中国学者很难看到。面对涉及各类学科的日本中国学著述,切实了解它们的最好方法无疑是阅读原著,而且是系统阅读,因为翻译有时难免会模糊两种文化的细微差异。然而,在很多有兴趣的学人还没有条件做到这一点的时候,翻译就显示着特殊的必要性。

我们选择一些篇幅不长、适于阅读的名篇名著、新人新作介绍给读者,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日本中国学的多种面孔。我们在坚持学术规范的同时,也不应排斥学术研究的个性化与多样化,这些研究和写作方法的异色,或许能帮助我们扩大眼界。



我们这套丛书，没有选择像斯波六郎所著《文选李善注所引古文尚书考证》，或者太田次郎所著《以旧抄本为中心的白氏文集本文的研究》那样大部头的专著，它们学术价值很高而读者面很窄。这些书很重要，等条件具备，也应该译介过来。我们先要做的，是希望读者能认识一批比较好接近的客人，也就是一批学者为非中国学专业知识分子写的书。

日本一些研究中国学的名家，很重视为一般读者写书。吉川幸次郎曾提出让学问回归大众的口号，白川静总结自己的学术生涯，也强调在孤诣独往苦苦求索的同时，要努力使学问返回到“一般”，即回报于社会。像青木正儿等人文笔之好，在学界早有定评，他们关于中国文化的学术随笔脍炙人口，几十年来一直是书店的畅销书。

我们选择的书目，除了几部新人新著外，都是“大家”写的“小书”。或侧重其保留中国文献资料的价值，或侧重对中国本土研究的补阙，或侧重于对中日关系研究的历史作用，或侧重于其在日本学界的影响。取其一点，不必求全，积少成多，不拘一格，兼顾学术性与可读性。通过这套丛书，读者便可陆续与那些久闻其名而未见其文的好友见面，共享日本中国学之景观。

目 录

文化

- 东洋人的发明····· 3
- 历史上所见中国南方的开发 ····· 15
- 元代的蒙古人 ····· 25

宗教

- 佛教对于六朝隋唐时代文化之影响 ····· 49
- 入竺求法的僧侣 ····· 57
- 关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 69

习俗

- 关于中国古代的祭祀 ····· 97
- 中国人辫发的历史····· 115
- 中国人食人肉的习俗····· 129
- 中国的宦官····· 135



气质

- 中国人的文弱和保守····· 147
中国人的妥协性与猜疑心····· 169

人物

- 秦始皇····· 185
中国历史上的伟人——孔子与孔明····· 207
东汉的班超····· 223

时事

- 黄祸论····· 233
中国的国教问题····· 247

附录:《东洋史说苑》及桑原中国学····· 钱婉约



文化

东洋人的发明
历史上所见中国南方的开发
元代的蒙古人



东洋人的发明

我将以《东洋人的发明》为题，做一小时的讲演。因为按照本协会的宗旨，与学问上的话题相比，还是教育上的、讲课过程中的话题更为合适，这一点我也是知道的。我还听说，两三天前也是在这个场合，白鸟库吉博士就中等教育的东洋历史作了讲演。因此，我又稍稍改变计划，认为选一个与学问有关的话题，或许也是合适的。所以，昨天就定了现在这个题目。我也知道，暑热时节，晦涩艰难的话题一定是遭人厌烦的。反正只有一个小时，我不讲难的话题。这一点请大家放心。

现代交通的便捷自不必说，在交通未开的时代，东洋和西洋之间，由于宗教上、政治上、商业上的关系，也有了相互之间的往来交通。因此，东洋文化与西洋文化互相影响，是确切的事实。有时是东洋文化对西洋产生影响，有时是西洋文化影响东洋。好像是在去年秋天十月，《新日本》杂志出了这样一个题目：“东洋人与西洋人谁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更多的贡献？”也就是关于谁在迄今为止的世界文化发展上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这个问题，寻求各方面人士的解答。但这问题不是简单可以回答的问题。东洋人的发明对世界文化的影响是事实，但与西洋的发明相比较，哪一方对世



界文化的贡献更多呢？这是一个不能一朝一夕就解决得了的难题。我只举东洋人发明中对世界文化有几分贡献的二三项事实，来作一个极其简单的介绍。

所谓东洋人的发明，首先东洋这个词汇是相当模糊的，内容不明确。我在此说的东洋，是极其狭义的意思，与东亚意思相同，且主要是指中国人。这一点首先交代一下。

东洋人的发明中，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印刷。中国的印刷术起源于何时，有不同的说法，至今学术界也未定于一说。但一般来说起源于隋，至晚是在隋朝的开皇十三年（593），当然也有学者对此持有异议，我对此也不是绝对相信。不过，到了唐代，就有了印刷术的发明是确凿无疑的事实，当时的文献也明确地记载了这个事实。近年来在新疆、敦煌地区发现的佛典中，也确定有唐代的刊本。在我国称德天皇时代（764～770）所制成的收藏在百万塔中的陀罗尼印本，也正好是唐中叶的时期，即八世纪中叶的遗物。日本称德天皇时代的印刷，是日本发明的，还是从唐朝传来的，也有不同的说法。我记得对日本印刷史有相当研究的原英国公使萨托，提出日本的印刷术肯定是从中国传去的，我也持有同样的想法。总之，这个陀罗尼印本，在今天世界上现存的印刷物中是最古的、而且是确知年代的遗物，则是不争的事实。刚才我说过，近年来在中国新疆、甘肃地区发现了古老的印刷物，遗憾的是没有明确的年代标记，偶尔有年代标记的，则是晚于我国的。所以，与我国百万塔中的陀罗尼印本相比，价值自然低了一等。

如上所述，从唐代开始，印刷佛典已经非常盛行。在其后的五代时期，也印行佛典之外的儒家经典。到了北宋时代，《史记》、《汉书》等史学著作也被印刷出来。但到那时为止的印刷活动，一



般都在寺庙或由政府进行。北宋末年到南宋初年,正好相当于西历十二世纪,民间首次有了书坊,进行书籍印刷及买卖活动。以上是中国印刷发展的顺序。

与印刷术相联系的是活版,即活字印刷,这比普通的木版印刷更加方便,对世界文化的影响也更大。活字印刷也是由中国人发明的,是由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一个叫毕昇的人发明的。这事在当时的文献中有明确的记载,确是事实。这位堪称“中国的古登堡”的毕昇发明的活字,是在粘土里加胶,再风干坚固而做成的。当时的方法是:先在平展的铁板上,涂上蜡或者松脂这些容易溶解的物质,再在上面排列土制的活字,在铁板下面点火加热,估计蜡或松脂开始熔化时,就在活字上面加上另一块铁板与下面的铁板平行,使活字的面成水平,从而进行印刷。当时也有木作的活字,至于用铜或铅等金属作的活字,在当时的文献中没有记载,到很久以后的后世文献中才有记载。这种金属制作的活字,比起中国文献,在朝鲜文献中更早见到。活字什么时候传入朝鲜尚不清楚,但在高丽时代的十三世纪中叶,已经做出了非常精妙的金属活字,并以此印刷书籍。这些金属铸的活字,在当时的高丽被称为“铸字”。根据十三世纪中叶李奎报所作的《详定礼文》的跋记载,当时就是用铸字将此书印行28部的。此后的朝鲜时代即李氏时代,活字运用更加频繁,特别是在李朝第三代太宗时,制作了铜活字数十万个。朝鲜人以发明铜活字为自豪,尽管从文献上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但在我的想像中,金属活字仍然应该是中国首先发明的。不幸的是,这一事实没有在中国文献中流传下来。发明这样的活字对于朝鲜人来说,似乎确有困难,当然这也无法断